

中国古代史论文集

第一辑



暨南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编

赠阅
请批评指正

1981



目 录

孔子思想的再评价·····	丘陶常 (1)
孔子教育思想的两面观·····	林乃桑 (29)
悲剧时代的伤时著作《齐物论》·····	陈炯光 (37)
论南越王赵论·····	徐恒彬 (61)
试论南汉的建国·····	唐 森 (79)
元史地理志西北地名考释·····	朱杰勤 (135)
明代屯田制度·····	李龙潜 (161)
明代白粮解运的方式与危害·····	鲍彦邦 (255)
佛山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和资本主义 萌芽的命运·····	林乃桑 (290)
陈寅恪先生及其《论再生缘》·····	饶展雄、高国抗 (312)
新中国陶瓷研究的主要成就·····	李知宴 (325)
广东青铜器时代述略·····	莫 雅 (338)
西樵山遗址和“西樵山文化”探讨·····	杨式挺 (386)
西樵山遗址讨论·····	何纪生 (428)
秦汉“黄肠题凑”葬制初探·····	单先进 (445)



A902020

孔子思想的再评价

丘 陶 常

关于对孔子思想的评价问题，近年来，报章杂志已登载过一些文章。我也提出自己的一点意见，与同志们商榷。

一、“知其不可为而为”的奴隶制维护者

我同意孔子是奴隶制的维护者的主张，以前曾写过文章。今天，再评价孔子的思想，必须遵循列宁的教导：对于具体的情况，具体的分析。毛主席也教导我们：“在阶级社会中，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，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”。要评价孔子的思想，就必须分析孔子所处的时代，他的身世和阶级立场。

孔子生于前551年到前479年，是处于春秋后期，正是中国历史从奴隶制向封建制激烈变革的时代。封建制的新的生产关系，正在奴隶制的母胎里孕育着，奴隶制的上层建筑也在走向瓦解。国人（自由民）起义、奴隶暴动的革命风暴，震撼着奴隶制度。新兴地主阶级则利用人民的革命力量，向奴隶主贵族夺权。整个奴隶制度，已趋于风雨飘摇之中。

孔子出生的鲁国，是周公的儿子伯禽的封国。宗周的典籍和典章制度，鲁国保存得最完备。鲁国的国都，是当时公认的东方各地的奴隶制文化的中心。另一方面，代表奴隶主贵族的鲁公室已经式微，政治的实权，却掌握在三桓（鲁桓公的三支后代）尤其是季孙氏手里。孔子生长在没落奴隶主

贵族的家庭，熟悉奴隶制的文化和典章制度。这样的时代，这样的鲁国，封建制将要代取奴隶制，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。出生于没落奴隶主贵族家庭的孔子身上，却又深深地盖着奴隶主阶级的烙印。这就决定了他成为一个“知其不可为而为”（《论语·宪问》，以下只写篇名）的奴隶制维护者。

因此，孔子在政治立场上，是倒向奴隶主贵族一边的。下面一系列的例子足以证明：

孔子憧憬着西周的奴隶制典章制度，对周公十分崇拜，他认为西周的典章制度，是批判、继承了夏、商两代的奴隶制文化（《为政》）的，到了西周就更完备了。他盛赞西周奴隶制文化的丰富多采，提出“吾从周”（《八佾》）。周公是奠定西周典章制度的重要人物，孔子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。由于他长久地不再“梦见周公”，就慨叹他衰老得多么厉害（《述而》）。可见孔子对西周奴隶制文化及其奠基人周公，是十分向往的。

在孔子看来，西周时代，“礼乐征伐自天子出”，“政不在大夫”、“庶人不议”，是奴隶社会的“盛世”，是“天下有道”。到了春秋的时候，由于奴隶制危机越来越严重，这个奴隶制的宝塔，自上而下地一层接着一层地塌了下来。“礼乐征伐”，不再“自天子出”了，而是“自诸侯出”，到“自大夫出”，甚至“陪臣执国命”。他咬紧牙齦地咒骂，说这是“天下无道”（《季氏》）。孔子对这种新局面是多么地看不惯呵！

当时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三桓，已掌握了鲁国的政治实权，他们都不把周天子看在眼里。他们在祭祀祖先的时候，居然用起只有周天子才能用的礼节，奏着《雍》乐来撤除祭

品；当政的季氏，竟敢去祭天子和诸侯才有资格去祭祀的泰山，孔子对这两件事很恼火，季孙氏还居然在自己的庭院里，用六十四人来奏乐跳舞，这种“八佾”（一佾即一队八人）的乐舞，原来也只有周天子才能用的。这种新兴地主阶级敢于蔑视奴隶主头头才有资格专用的革新精神，孔子认为是目无周天子，大喊大叫：“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”（“这都可以狠心做出来，哪什么事情不可以忍心做出来呢！”）（以上俱见《八佾》）。孔子的弟子冉求，帮助季孙氏实行新的田赋制度，孔子很生气，开除他的学籍，还鼓动学生们去攻击他（《先进》）。为了削弱三桓的力量，于前498年，孔子唆使他的弟子子路，设计毁掉三桓的都城，这叫做“堕三都”（《左传》定公十二年）。在西周，只有诸侯才有国都，世卿是不能筑都城的。世卿筑都，称为“耦国”，在制度上是不能容许的。孔子“堕三都”的目的，在于强公室，弱私门，维护西周奴隶社会的礼制。

孔子仇视新兴事物，仇视新兴地主阶级革命，仇视奴隶暴动。前513年，晋国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赵鞅（赵简子）把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律铸在“刑鼎”上，孔子大叫这是破坏唐叔（周成王的弟弟唐叔虞）所订定的制度和奴隶制的等级秩序，这样就会“贵贱无序，何以为国”，晋国这个奴隶制的国家就快要灭亡了（《左传·昭公二十九年》）。前481年，齐国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陈恒（陈成子）杀掉了奴隶头子齐简公，孔子急急忙忙地去见鲁哀公，诉说“陈恒弑其君”，请派兵讨伐他（《宪问》、《左传》哀公十四年）。前522年，郑国奴隶在“萑苻之泽”（今河南中牟县西北）暴动，被郑国的奴隶主镇压下去，孔子听到这个消息，高兴

得跳起来，大叫：“善哉”（“好极了”！《左传》昭公二十年）。孔子对当时社会大变革中在政治上出现的许多“臣弑君”、“子弑父”的事情，都一律把它们叫做“乱臣贼子”，深恶痛绝，就不一一列举了。晋国范中行氏的家臣佛肸，做中牟的县宰，发兵抗拒赵鞅；鲁国季孙氏的家臣公孙弗扰，盘据季孙氏的都城费邑，进行叛乱，都来邀请孔子，孔子都准备去。子路不高兴孔子到公孙弗扰那里去，孔子解释说：“如有用我者，吾其为东周乎”（俱见《阳货》）。这就是说：假如有人用我，我将把西周奴隶制的典章制度，在东方复兴起来。孔子决心维护摇摇欲坠的奴隶制，不是昭然若揭了吗！

孔子很轻视女人和下层人民。他说：“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”（《阳货》）。他轻视农业劳动。他的弟子樊迟，请教他如何种田？他答道：“吾不如老农”；又问他如何种菜？孔子又回答说：“不如老圃”。樊迟走后，背地里又骂他：“小人哉，樊须（樊迟）也”（《子路》）！孔子还说什么：“君子只求行道，不谋求衣食；耕田要饿肚皮，做官才能享受俸禄”（《卫灵公》）。由此可见，孔子满脑子里都是奴隶主贵族的思想意识。

孔子的生活很考究。夏天穿细麻葛，冬天穿各种兽类的皮袍。衣服有一定的尺寸，还讲究什么颜色配什么色的边。他“食不厌精，脍不厌细”，粮食有了臭味，鱼肉腐烂了，都不吃；食物变了颜色，有了气味，也不吃；烹调坏了，调味不好，甚至切割得不端正的，以及过了时的蔬菜，都不吃。他“食不语，寝不言”，“席不正，不坐”。在各种不同的场合，怎样说话、走路，都有一定的格式（《乡党》）。

清规戒律很多！这些都是奴隶主贵族养尊处优、摆架子的生活方式。

孔子的心爱弟子颜渊死，孔子很悲愤！颜渊的父亲颜路，请求孔子买掉车子，给颜渊办外椁（也作槨。里面叫棺，外面叫椁）。孔子说：我的孩子鲤死时，也是“有棺而无椁”的。况且我是大夫，“不可徒步而行”，出入就不可无车，不肯答应。门人要厚葬颜渊，向孔子请示，孔子认为：颜渊的身份、地位不应该厚葬，不答应。后来，门人违背他的意见，厚葬了颜渊。孔子说：这不是我的主意呀，是你那班同学干的（俱见《先进》）。在孔子的心目中，奴隶制的宗法等级制度，又是何等森严！

当新兴地主阶级取得了政治地位的情况下，孔子在鲁国终于站不往脚。他周游列国十四年，兜售他那套维护奴隶制的主张，到处碰壁。回来后还不死心，办起学校来，为奴隶主贵族培养接班人。说明他确是一个“知其不可为而为”的奴隶制维护者。

另一方面，由于孔子早年的生活很贫困，尝给奴隶主贵族“相礼”。这是一种比较低贱的职业，因而和下层人民还是有所接触的。在当日国人起义、奴隶暴动的怒潮中，震撼着整个奴隶制度。劳动人民革命力量的强大，在孔子的头脑中也有所反映，因而又存在着这样的思想，即在不触动奴隶主贵族的根本利益的前提下，重视和改善下层人民的待遇，来缓和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，使奴隶主的统治秩序能够维持下去。这种思想，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，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。这点我们也必须看到。因此，在孔子的头脑里，既有守旧的一面，也有维新的一面，他的思想本质

是保守的，是一个“知其不可为而为”的奴隶制维护者，是一个守旧的思想家。但说他是顽固派，也是不对的。

二、鼓吹宗教天命论，也不语

“怪、力、乱、神”

宗教天命论是奴隶主阶级的精神支柱，也即是奴隶主阶级的世界观。《尚书·召诰》说：“有夏服（受）天命”；《诗经·商颂·玄鸟》说：“天命玄鸟，降而生商”；《诗经·大雅·大明》说：“有命自天，命此文王”；《诗经·鲁颂·閟宫》也说：“赫赫姜嫄，上帝是依”；“天锡公纯嘏，眉寿保鲁”等等。不论夏、商、周三代的最高统治者也罢，或是诸侯国的头头也罢，这些奴隶主的统治阶级，都把他们打扮成上帝的儿子，秉承天命来统治人间，他们天生是骑在奴隶们的头上作威作福的；奴隶们当牛作马，也是命中注定，是活该的。他们就拿着“天命论”这块盾牌，来粉饰他们“压迫有理”、“剥削有功”，把罪恶的阶级压迫、剥削合理化。

孔子即出身于没落奴隶主贵族，坚定地站在奴隶主贵族的阶级立场上，这就决定他的世界观，必然是奴隶主阶级的宗教天命论。

在孔子看来，“如果得罪了上天，祷告也没有什么用处的”（《八佾》）！孔子到卫国去，和当日把持卫国奴隶主政权的卫灵公夫人南子相见，她是一个漂亮而淫荡的贵妇人。子路对这件事很不高兴。孔子当天发誓说：“假如我做了不正当的事的话，天厌弃我罢，天厌弃我罢”（《雍

也》)！有一次，孔子病得很厉害，命在垂危。子路按照当时卿大夫僭用诸侯治丧的礼节，嘱咐孔子的某些弟子，扮作孔子的家臣，为他准备后事。后来，孔子的病渐渐好了，知道这件事，大发脾气。骂道：“仲由（子路）很久以来就干了这些骗人的勾当了，我明明没有家臣，却一定扮作有家臣。我欺骗谁呢？欺骗上天吗”（《子罕》）！孔子也和奴隶主阶级的头头一样，把天看成监临人间的有意志的天神。

孔子认为他的品德是高尚的，是上天付给他的。他在周游列国的途中，从曹国往宋国去，和他的弟子们在大树下学习礼节。宋国司马桓魋（音颓）欲杀孔子，砍掉那棵大树来示警，弟子们催他赶快离开。孔子大言不惭地说：“上天在我的身上生了这样高尚的品德，那桓魋能把我怎样吗”（《述而》·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）？孔子的得意门生颜渊死了，孔子朝天大喊：“咳！老天爷要我的命呀，老天爷要我的命呀”（《先进》）！他自夸“五十而知天命”（《为政》）。追随孔子的一些人，也这样吹捧他：“上天会要他老人家做人民的导师（木铎）哩”（《八佾》）！把孔子吹捧成承受天命的“圣人”。

在国人起义，奴隶暴动的怒潮中，奴隶们把奴隶主阶级的天命论踩在脚下，鄙视奴隶主贵族——大人，不听他们的代言人——“圣人”的话。孔子针对这种情况，提出“三畏”：“君子有三畏：畏天命，畏大人，畏圣人之言”（《季氏》）。这三者实际上是一个东西，即维护奴隶主贵族统治的意志。用“三畏”来吓唬广大奴隶和劳动人民，在天命、大人，圣人三位一体的统治下，俯首帖耳地甘承奴役，忍受剥削。他说什么：“不相信命运，就没有可能作为君子”

（《尧曰》）。人们的生和死是命运所决定，富和贵是得之于上天的；他的学生子夏就这样说：“生死听从命运，富贵由天安排”（《颜渊》）。奴隶主贵族的富贵是上天给的，奴隶们的贫贱也是命中注定的。要“乐天知命”，要“安分守己”，“犯上作乱”，起来闹革命，反对奴隶主阶级是会得罪上天的。孔子就这样抛出这块天命论的盾牌，妄图挽救奴隶制面临崩溃的命运。

在春秋时期，奴隶制受到严重的打击，宗教天命论也普遍动摇，出现了一片怨天、疑天、骂天的呼喊声。有的埋怨上帝不管他们的死活（“上帝板板，下民卒瘁”；《诗经·大雅·板》）。有的咒骂上帝变坏了（“荡荡上帝，下民之辟，疾威上帝，其命多辟”。《诗·大雅·荡》）。有的愤恨上帝降下了祸乱、饥馑（“天降丧乱，饥馑荐臻”，“瞻仰昊天，曷惠其宁”。《诗经·大雅·云汉》），甚至连上帝也否认了，《诗经·小雅·十月之交》就明显地指出：“劳动人民之所以受罪，并不是从上帝降下来的！（“下民之孽，匪降自天”）而是“天下没有善政”（“四国无政”），实由于人（“职兢由人”）。这样就开始接触到社会的阶级根源了。在当日的思想界上，也出现了一些朴素唯物论的思想。这种思想，也反映到孔子的头脑上来。孔子曾经答复子贡的问话说：“天说了什么呢？四季照样运行，百物照样生长，天说了什么呢”（《阳货》）！有一次，孔子站在河边，俯视流水，叹道：“一去不回就像这样罢，日夜不停地奔流着”（《子罕》）！上面这些思想，就具有朴素唯物论与朴素辩证法的观点。

孔子对鬼神也抱着怀疑的态度。他说：“祭如在，祭神

如神在（《八佾》）。两个“如”字，就是说：祭神的时候，好像神在一样。这就是说：不是真正有神在。子路问他如何服事鬼神？他回答说：“活人还不能服事，还能够服事鬼神吗？”子路又问他人死是怎么回事？他答道：“生的道理还没有弄明白，怎能懂得死的道理呢”（俱见《先进》）！孔子曾这样说：“不是自己应该祭的鬼神，却去祭它；这是谄媚”（《为政》）。孔子平常就不谈“怪、力、乱、神”（《述而》）。即关于怪异、勇力、叛乱和鬼神的事情。可见孔子还受着当日唯物论思潮的影响，从这点来说，多少是具有进步性的。

孔子尝答复樊迟提出怎样才算聪明的问题。孔子回答说：“把精力放在统治人民的工作上，对待鬼神要尊敬，却不要去接近它，这样就可以说是聪明了”（《雍也》）。一面对鬼神有怀疑，一面却说对待鬼神要尊敬。说到底，孔子还是以“神道设教”，要利用鬼神去欺愚广大的奴隶们和劳动人民，为维护摇摇欲坠的奴隶制效劳的。

三、“上智与下愚不移”和

“性相近，习相远”

正由于孔子的世界观是宗教天命论，因此，在人性论上，也表现为天才论。

在奴隶社会里，奴隶制的宗法等级是森严的。孔子站在奴隶主的阶级立场上，把人性分为四等，一等是“生而知之”，二等是“学而知之”，三等是“困而知之”，“困而不学”是最下的一等（《季氏》）。实际上是三等，“学而知

之”可说是“中人以上”的等级，“困而知之”则属于“中人以下”的等级，这里“学”字很重要。孔子认为：“中人以上，可以语上也，中人以下，不可以语上也”（《雍也》）。只有“中等以上”的人，靠近上等一边，才可以告诉他们高深的道理；“中等以下”的人，却靠近下等一边，就不可以告诉他们高深的道理。很明显，在“上智”与“下愚”之间，存在着一个“中人之性”。他又说：“唯上智与下愚不移”（《阳货》）。“上智”是“生而知之”，是“天才”；“下愚”是“困而不学”，是天生的蠢货！他们的人性，都不可能移易的，是改变不了的。很明显，所谓“上智”、“天才”，当然是奴隶主阶级；所谓“下愚”、“蠢货”，自然是广大下层人民了。在这里，就暴露出孔子的奴隶主贵族立场。

孔子又认为：“人的天性是相近的，只由于后天的习染不同，才相距越来越远了”（《阳货》）。要改变习染对人们的影响，就要学习，这自然是指“中人之性”，即一般人的天性来说的。既然奴隶阶级的人性，属于“上智”、“天才”，所以他们的人性应当是善的。既然奴隶主阶级不把奴隶阶级当作人看待，奴隶阶级自然不存在人性问题。关于性善问题，孔子虽然没有明显说出，但从言外之意，可以看出孔子是属于性善论者。到了孟子，就明显地提出来。

孔子说自己的学养是从喜欢奴隶制的古代学术文化，勤奋勉力地学习寻求中得来的，并“非生而知之者”，并非“上智”、“天才”。他说：“若圣与仁，则吾岂敢”。这是他在表面上自谦的话。另一方面，他又说：他的品德是上帝给的。说什么：“天生德于予”（以上俱见《述而》）。

他的学生子贡又吹捧他是：“固天纵之将圣”（《子罕》）。这正是“夫子自道”，表明他就是属于“上智”方面，是“天才”，是“圣人”，自吹自擂。

孔子宣扬这种唯心主义先验论的人性论。把奴隶主阶级说成是“上智”、“天才”，生下来就是上等人；下层人民是“下愚”，“蠢货”是天生的下贱者，用来论证奴隶制度的合理性，其反动的政治目的是一清二楚的。

四、提倡“克己复礼”，“天下归仁”

孔子的核心思想是“仁”。“仁”最根本的一条，就是孝和悌。他的学生有子（有若）说：“孝、悌也者，其为仁之本与”（《学而》）。孔子教导后生小子，“在家要孝敬父母，出外便恭敬兄长”，“孝”是对父母说，是就纵的关系而言，这是“尊尊”；“悌”是对兄弟之间说的，是就横的关系而言，这是“亲亲”。能够做到“孝”和“悌”。整个宗族便能团结，得到巩固。宗族是中国奴隶制的社会基础，用“孝”和“悌”来加强宗法血缘关系的纽带。社会基础打好了，春秋时期那种“臣弑君”、“子弑父”的“乱伦”现象，就得到抑制和克服，摇摇欲坠的奴隶制度，也就重新得到巩固。这方面，在孔子的弟子的心目中，也很清楚的。子夏（卜商）说：“能竭尽自己的力量奉侍父母，就能够忘身忘家去服事君上”。有子说得更清楚：“做人能够孝顺父母，敬爱兄弟，却喜欢去触犯上级，这种人是少有的。不喜欢去触犯上级，却喜欢去做叛逆不道的事，这种人不曾有过的”。曾子（曾参）更概括、扼要地说：“慎终追远”的目的，是为了“民德归厚”（以上俱见《学而》）。来缓和阶

级矛盾。

在中国奴隶社会里，族权和政权、父权和君权，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，形成了一套严密的奴隶制宗法等级制度。孔子和他们的门徒们，就是想提倡“孝”、“悌”作为“仁”的根本，维护家族里父子和兄弟的关系，进而在政治上巩固君与臣的关系，用来消弭当时从奴隶主阶级内部分化出来的新兴地主阶级，对奴隶主贵族的“犯上作乱”的行为，并影响广大奴隶阶级和劳动群众，趋于“厚道”，不起来造奴隶主阶级的反，藉以稳定奴隶制的社会秩序。

在这个基础上，孔子又提出“克己”、“复礼”、“归仁”。他说：“克己复礼为仁，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焉”。（《颜渊》）“克己”是为了做到“复礼”，一旦能够做到按照西周的礼制行事，就能达到“天下归仁”的目的。旧说把“归”训为“称”，“天下归仁”就是天下的人都称赞他能做到“仁”。我是不同意这种训释的。在我看来，“归”应就原来的意义，训为“返”。“天下归仁”就是说：天下的人都回到“仁”的范畴来。这和上面所说的，孝与悌是为了“慎终追远”，是手段，“民德归厚”是目的。同样，“克己复礼”是手段，“天下归仁”是目的，即回到奴隶社会的“仁”的理想境界上来。

怎样做才能达到呢？孔子紧接着上面的话指出：“为仁由己”（《颜渊》）。就是先从自己做起。孔子曾对曾参说：“我的学说贯穿着一个基本概念，这个基本概念就是‘仁’。曾参认为：“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”（《里仁》）。就是说：做人之道，要从“忠恕”二字做起。什么叫做“忠、恕”呢？尽己叫做“忠”，推己及人叫做“恕”。总的精神在

于克制自己，叫做“克己”。这两方面，孔子着重在“恕”字，仲弓曾问孔子，怎样才能做到“仁”？孔子答道：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（《颜渊》）。子贡也曾问孔子说：“有没有一句话就可以终身奉行的呢”？孔子答道：“就是‘恕’字罢！自己所不想要的任何事物，便不要加在别人的身上”（《卫灵公》）。子贡也曾这样说：“我不想别人欺侮我，我也不想欺侮别人”（《公冶长》）。这是“恕”字的消极一面。更进一步，就要做到：“自己要站得住，也要别人都能站得住；自己要事事行得通，也要别人事事都能行得通”。（《雍也》）。这是“恕”字的积极的一面。为什么这样做呢？就是在于“复礼”。要做到“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”（《颜渊》）。凡是不符合于周礼所规定的，都不去看，不去听，不去说，不去乱动，这叫做“四勿”。每个人都要用周礼做规范，要“立于礼”（《泰伯》）。孔子教他的儿子伯鱼（鲤）说：“不学礼，便没有立足于社会的依据”（《季氏》）。这就是说：作为一个奴隶主，一定要懂得周礼，立足于周礼。

很显然，孔子之所以强调“忠、恕”，主要是针对从奴隶主贵族分化出来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那些“犯上作乱”的人说的，他要求人们要在周礼既定的框框里来克制自己，恢复奴隶制的宗法等级秩序，即是“复礼”，用来消弭奴隶主阶级内部的矛盾，加强奴隶主阶级内部的团结。这样，广大奴隶阶级和劳动人民就会听话，不敢起来反抗，这就达到了“天下归仁”的目的。

孔子曾答樊迟问“仁”。孔子答复说：“仁”就是“爱人”（《颜渊》）。有的同志认为这是“泛称”，包括所有

的人。也许孔子在主观的意识上是这样。因为任何剥削阶级，总是自欺欺人，向别人隐瞒其思想观点，同时也欺骗了自己，把自己封为全民的代表，向着全民讲话，用来维护其狭隘的阶级利益。但在实际上，什么阶级说什么话，何况孔子是代表奴隶主阶级的，奴隶主从来不把奴隶当人看待，划在“人”的范畴之外的。因此，孔子所说的“爱人”，是有它的阶级涵义的。毛主席远在三十年前，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这篇文章里就指出：“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，至于所谓‘人类之爱’，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，就没有这种‘统一之爱’”。孔子就这样说：“君子之中，不仁的人也会有，但在小人之中，却不会有仁德的人”（《宪问》）。孔子的“爱人”，只限于奴隶主阶级内部；他的论“仁”也是从奴隶主阶级内部说话的，这不是很清楚了吗？！

另一方面，由于奴隶社会的趋于崩溃，人民力量的抬头，开始挣脱了奴隶的枷锁，社会地位有所提高，这在孔子的头脑里，也有所反映。有一天，马棚失了火，孔子退朝回来，问道，“伤了人吗”？不问到马（《乡党》）。可见当日在孔子的心目中，人已不和畜牲一样对待，而是有所区别。不是“目中无人”，而是目中开始“有人”了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孔子提出“爱人”，在一定程度上，多少也改变了过去奴隶主把奴隶当作会说话的工具的旧观念，这是新观点的萌芽。这是长期以来，奴隶们不断浴血斗争去争取来的。

五、正名、德治、礼治

孔子既然认为“克己复礼”才能做到“仁”。因此，在

政治上恢复西周的礼制就很重要。在当日国人暴动，奴隶起义的革命浪潮冲击之下，出现了“礼崩乐坏”的局面，要维护奴隶制，就必须恢复西周的礼制，这就要从“正名”入手，纠正被搞乱了的奴隶制宗法等级制的名分，这就是孔子所主张的“正名论”。我们从孔子答复齐景公的一席话，就可以看得很清楚。齐景公请教他如何整顿政治。孔子答复他说：“做人君的要像个君，做人臣的要像个臣，做父亲的要像父亲的模样，做儿子的要真正像个儿子”，要把以宗族为基础的奴隶制宗法等级制恢复过来，做到君仁、臣忠、父慈、子孝，奴隶制的社会秩序，才能够安定下来。齐景公听到他说到为政的要害，很是佩服。忙说道：“对呀！若是君不像君，臣不像臣，父不像父，子不像子，”像眼前乱烘烘的社会秩序，到处国人暴动，奴隶起义，新兴地主阶级起来夺权，“即使仓库里的粮食很多，我能吃得着吗”（《颜渊》）。可见孔子把纠正名分看作是治理国政最首要的一着。孔子对子路说：“名分不正，讲起话来就不顺当；说话不顺当，事情就办不成；礼乐不能复兴，刑罚的执行就会不得当；刑罚不得当，老百姓就不知怎样做才好”。孔子从“克己复礼”的角度来看，认为：“假如端正了本身的行为，治理国家有什么困难呢？假若连本身都不能端正，又怎样去端正别人呢”？他又说：“本身的行为端正了，就是不发命令，事情也行得通；假如本身行为不端正，就是三申五令，老百姓也是不会信从的”（以上具见《子路》）。季康子问孔子怎样从事政治？孔子答复说：“政字的意思就是端正，你能带头端正自己，那个敢不端正呢”（《颜渊》）！孔子站在奴隶主贵族的立场上，要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季孙